

讨论与评议

唐代以后所谓“拂菻”遣使中国考

张绪山

摘要:“拂菻”是隋唐时代中国对拜占庭帝国的称呼。唐代拜占庭帝国曾数次遣使中国。唐代以后,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实际上已无外交往来,但《宋书》和《明史》仍在“拂菻”名义下保留了所谓官方遣使的记录。实际上,《宋书》的“拂菻”已不是拜占庭帝国,而是占据了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领土的塞尔柱突厥人;《明史》中的使节乃商人,并非官方使节。

关键词:“拂菻”; 拜占庭帝国; 中国

作者简介:张绪山,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

“拂菻”是中国人对拜占庭帝国的称呼。隋唐时期,中国与拜占庭帝国有过数次外交往来,^①但随着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的兴起及其对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领土的征服,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联系已被切断,故唐代以后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联系已不复存在。有趣的是,唐以后的中国史籍中仍有“拂菻”国遣使的记载。考稽唐代以后汉籍有关“拂菻”(或“大秦”)的记载,远比此前的记载复杂,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事实前提。

首先,唐朝军队自天宝十年(751)在怛逻斯之战遭受败绩及“安史之乱”以后,实际上已放弃对西域的经营,阿拉伯帝国对伊朗高原的全面征服及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减少乃至阻断了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联系,其结果是,中国所获得的拜占庭帝国的真实知识大为减少,真实的“拂菻”帝国逐渐淡出中国人的实际接触范围。“拂菻”这个名称虽然没有消失,但被逐渐虚幻化,演化成

一种文化符号进入文人墨客的作品中。^②

拜占庭帝国曾经在中国对外交往中有重要影响,汉唐中国对希腊—罗马世界已有的旧知识,与新获得的西方知识的混杂,成为干扰中国人对这个若隐若现的西方帝国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干扰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希腊—罗马世界的组成部分,地中海东部地区在汉唐史籍中被称作“大秦”,由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兴起,这同一个地区又被称作“拂菻”,故唐代又有“拂菻即大秦”的认识;另一方面,唐代景教入华初期以“波斯景教”为人所知,但景教在华力量的发展,使华人对于景教之于大秦的关系获得较清楚的了解,天宝四年九月玄宗诏令两京“波斯寺”改为“大秦寺”并令中国境内诸府郡进行同样的更改。^③但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景教遭禁之后,“大秦”与“波斯”的关系又逐渐模糊起来。进入宋代,这两个国家又被混同为一。如1296年至1271年编就的《佛祖统记》卷三九:“初波斯国苏鲁支立末尼、火袄教,敕于京师建大秦寺。”又同书同卷“延载元年(694)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

① 参见张绪山:《唐代拜占庭帝国遣使中国考略》,《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

② 参见林英:《唐代拂菻丛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6—187页。

③ 《唐会要》卷四九记玄宗诏“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西海大秦人)持《二宗经》伪经来朝。”很显然,波斯国与大秦混为一谈了。这些因素使宋代史籍涉及“拂菻”国的内容变得光怪陆离。

其次,不同种族对拜占庭领土的征服使“拂菻”名称更加复杂化。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的兴起及其对拜占庭领土的征服,使原来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命名上染上伊斯兰色彩,慧超所谓“大拂菻”与“小拂菻”的记载说明,与“拂菻”一名相关的事物,并非总是指向当时拜占庭帝国治下的领土,有时涉及早已归属阿拉伯统治范围的事物。^①11世纪塞尔柱突厥的兴起及其向小亚细亚的扩张,它对拜占庭帝国领土的占领,它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它在小亚所建立的“罗姆苏丹国”对“罗马”(Rum)名称的僭用,无疑使地理学意义上的“拂菻”名称的含义更加复杂化。正如赫德逊所指出“拂菻既指罗马帝国也指扩张所得的领土;当这些领土又被另一个势力占领时,在这一名称的使用上自然就出现了混乱。叙利亚曾经属于罗马,而且是中国人真正知道的唯一的那部分罗马帝国,显然在它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仍被包括在拂菻的名字中,因此从那以后对拂菻的叙述肯定包括了穆斯林特色。同样,塞尔柱征服安纳托利亚使他们也认为是拂菻,而他们自己则称他们的安纳托利亚王国为Rum。”^②换言之,“拂菻”这个名称既可以用来指称仍为拜占庭帝国控制的原罗马帝国领土,也可以指以叙利亚为中心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区,也可以指塞尔柱在小亚建立的国家。研究宋代以后以“拂菻”名义的遣使必须考虑上述诸因素。

关于宋代“拂菻”名义下向中国的遣使,《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记载:

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

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箏、篪、遍鼓。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王之服,或青、绿、绯白、粉红、黄、紫,并缠头跨马。城市田野皆有首领主之。每岁惟夏秋雨。得奉给金钱锦谷帛以治事,大小为差。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元祐六年,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裘衣、金束带。

又,《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拂菻国》记载:

(宋徽宗)元丰四年(1081年)十月六日,拂菻国贡方物。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言:其国东南灭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又东至西大石及于阗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鞑靼,次至种榭,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擒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

据此记载,在赵宋一代,拂菻国曾向中国三次遣使。这是唐代拂菻国数次遣使三百年后“拂菻”之名的再次出现。隋唐时代文献中“拂菻”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名称殆无疑义,而《宋史》明言这时向中国遣使的拂菻国“历代未尝朝贡”,故不能将宋代文献的“拂菻”与隋唐时代的“拂菻”简单地等同起来。

元丰四年即公元1081年,元祐六年即1091年。这是我们考订其中历史事实最重要的基点之一;而了解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形势,则是考证《宋史》“拂菻”何所指的前提。揆诸拜占庭帝国历史,公元1081年正是拜占庭帝国内外危机日趋严峻的年代。内政的混乱且不待言,帝国面临的外

① 慧超“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大食)国。彼王不住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彼国复居山岛,处所极罕(罕),为此就彼……又小拂临,傍海西北,即是大拂临国。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寔数回讨击不得。突厥侵亦不得。土地足宝物,甚足驼、骡、羊、马、叠布等物。衣着与波斯、大寔相似,言音各不相同”。见《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张毅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8、116页。

②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p. 133.

族入侵正在逼近。兴起于中亚的塞尔柱突厥征服阿拉伯夺取的伊朗领土后,正在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新主宰。塞尔柱突厥原是中亚突厥乌古思族的一个分支,公元985年前后,塞尔柱突厥部落从中分离出来,分布在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11世纪初叶跨过阿姆河,1040年之后占领呼罗珊地区。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在其首领图格利尔伯格(Tughril Beg, 1037—1063年在位)的领导下进入巴格达,控制了阿拉伯哈里发,被授予“苏丹”(al-sultān,意为“权威”)称号,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实际统治者。图格利尔的继承者阿尔斯兰(1063—1072年在位)继续其扩张事业,1064年夺取了作为拜占庭帝国一个省区的亚美尼亚的首都阿尼,开始了对拜占庭帝国领土的征服。1071年在亚美尼亚凡湖以北的曼齐卡特(Manzikert, Malāzkird, Malāsīrd),塞尔柱军队击败拜占庭军队,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迪奥格尼(Romanus IV Diogenes, 1068—1071),在小亚的拜占庭帝国土地上获得一个永久性立足地。阿尔斯兰的堂弟苏莱曼·伊本·库特鲁米什管理小亚细亚的新征服区,于1077年在新征服区建立塞尔柱人的罗姆素丹国(Rūm Sultānate, 1077—1308),尼西亚(Nicea)为其首府,1084年伊科尼姆(Iconium)成为首府,罗姆素丹国在1300年以后为后起的奥斯曼土耳其所取代。^①

元丰四年的“拂菻”遣使,发生在阿尔斯兰的儿子、著名的塞尔柱人素丹马立克沙(Malik Shah, 1073—1092)在位时期。《宋史》所谓“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中的“灭力沙”,指的就是塞尔柱苏丹统治的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的拂菻国,不可能是指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而只能是以小亚为根据地的罗姆素丹国;所谓“东南至灭力沙四十程”显然是指叙利亚而言,去北方四十程到达的“海”指达达尼尔海峡或黑海,而“西海”当指地中海。^②“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一句,似指塞尔柱突厥使

节到达中国的路线。“历代未尝朝贡”,说的是塞尔柱突厥人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实际情况,并非误解。后人对此失察,以为“拂菻”一称自始至终都是拜占庭帝国的称呼,故对《宋史》记载的矛盾不得其解;或横加穿凿,难以自圆其说。《明史·拂菻传》认为“拂菻,即汉大秦,桓帝时始通中国。晋及魏皆曰大秦,尝入贡。唐曰拂菻,宋仍之,亦数入贡。而《宋史》谓历代未尝朝贡,疑其非大秦也。”《明史·拂菻传》认为汉魏史册的“大秦”就是唐代的“拂菻”,是正确的,但认为宋代的“拂菻”仍是唐代的“拂菻”,则是错误的;同时又怀疑《宋史》所谓“历代未尝朝贡”的“拂菻”另有所指(所谓“疑其非大秦”),不是见于历代文献的“拂菻”,在逻辑上陷于自相矛盾。现代学者如张星烺认为“《宋史》言拂菻历代未尝朝贡,可谓谬甚”,^③实际上也是认为汉代之大秦、隋唐“拂菻”与宋代“拂菻”为一脉相承,未注意“拂菻”名称所指区域的变化,洞悉其中的曲折关节。

《宋史》“拂菻”即塞尔柱人国家,这一结论还可由几层内证落实:第一,气候。《宋史》明载“其国地甚寒”,“每岁惟夏秋雨”。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兴起并夺取其地中海即北非领土以前,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主体为黑海与爱琴海—地中海两片海域分隔开来:巴尔干—希腊半岛为其一部分,小亚细亚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为其一部分。在这两部分领土上,多数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其特点是,夏季干燥炎热,冬季潮湿多雨;只有塞尔柱突厥人控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和东部的气候,符合所谓“国地甚寒”,“每岁惟夏秋雨”的内陆气候特征。第二,物产。小亚美尼亚国是位于罗姆素丹国南部小亚半岛上的小国,13世纪中叶该国国王海屯(Haitum)记载,当时的罗姆素丹国的版图东接大亚美尼亚和谷儿只(格鲁吉亚),西至阿塔梁(Attalien)城临海,北枕黑海,南至小亚美尼亚和西里西亚(Cilicia),物产有“银、铁、铜、明矾、果物、各种动物、特

① 参见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69、572页。

② 参见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1辑,王古鲁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1939年,第60页。

③ 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5页。

产良马”；《宋史》所记“拂菻”物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葡萄酒酿酒”二者记载颇多符合。^①牛、羊、马、独峰驼等动物主要产于小亚细亚山区和西亚沙漠地带。第三，国王服饰习俗。《宋史》记载中，拂菻“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缠头跨马”，这种描述显然指向信奉伊斯兰教的素丹，而非拜占庭的基督教皇帝。缠头是穆斯林有别于其他教徒的最显著的风俗之一。这种习俗源于阿拉伯半岛上的土著贝都因人。阿拉伯半岛气候炎热干旱，缺水少雨，人们缠头抵挡炎炎烈日，同时防御沙尘。伊斯兰教诞生之后，以头巾缠头演变成为一种宗教习俗，成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的区别标志之一。《明史·天方传》：“人皆欣硕，男子削发，以布缠之。”又《明史·默德那传》：“俗重杀，不食猪肉，常以白布蒙头，虽过他邦，亦不易其俗。”这种风俗在明代已为中国人所熟知。

以上证据表明，《宋史》“拂菻”国与塞尔柱罗姆素丹国的勘同，大致不成问题。^②

二

元丰四年十月，向中国宋朝廷遣使的拂菻王“灭力伊灵改撒”究为何人？他所派遣的“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究为何人？许多研究者以为“拂菻”指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所以将“改撒”还原为罗马帝国的 Caesar（凯撒），希腊语的 Καίσαρ，试图在拜占庭帝国诸位皇帝中寻求与“灭力伊灵”相近或相似的名字。德经（De Guignes）、波提埃（Pauthier）、布列施乃德（Bretschneider）等汉学大家将其考证为 Michael VII Parapinaces，认为“灭力伊灵改撒”是 Michael Caesar 的译音。亨利·裕尔对此见解有些犹豫不决，提出“如果米哈伊力（Michael）一名不能被接受的话，我测想僭夺皇位者 Bryennius Caesar 的名字将是唯一的选择”，^③但他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

进一步的论证。

法国汉学家沙畹认为，“灭力伊灵改撒”是 Caesar Nicephores Melissenus 的译音，Melissenus 是 Alexius Comnenus 的妹夫，他于 1080 年初被塞尔柱突厥人推拥，在小亚称帝，将小亚各城管理权交给突厥人；1081 年 Comnenus 在君士坦丁堡称帝，Melissenus 接受 Caesar 称号，势力与 Comnenus 相匹。Melissenus 以希腊语称号亦作 Melissenos Nicephoros Kaisar，所以《宋史》的“灭力伊灵改撒”即为此名的译音。不过，沙畹觉察到以 Melissenos 比对“灭力伊”在对音上的困难，所以他认为“灭力伊”应为“灭力侯”，“灵”为“神灵”之义，相当于希腊语的 Nicephoros 称号。他说，将“灭力伊灵改撒”改为“灭力侯改撒”，以对应 Melissenus Nicephoros Kaisar，是因为中国人译外国名称多有谬误。^④这一观点受到我国学者杨宪益的赞同。^⑤然而，如以《宋史》“灭力伊灵改撒”为拜占庭帝国的君主，则《拂菻传》诸多内容难得正解，尤与“历代未尝朝贡”的描述不相符合。

夏德认为，“公元 1081 年拂菻王派出来华的使团，称其王灭力伊灵改撒，一定是一位副王（Melek Malik，塞尔柱人的总督之一），也许就是苏丹之弟 Tutusch 或苏利曼，此二人均在 1078 年被苏丹封为副王（subkings，Melek）。他不同意将“灭力侯改撒”考证为 Michael VII Parapinaces 的观点，因为此王在 1078 年已经逊位，并且“灭力侯改撒”与 Michael 只有开头的第一个音节相类，其他音节不对应。夏德认为，“改撒”对应 Caesar 是毫无问题的，许多人认为 Caesar 一称，仅指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实际上，自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及其他罗马各省以后，以凯撒自称的并不仅仅限于罗马皇帝。在塞尔柱人看来，灭力沙（Milishah）是旧时罗马省份上的正式国王，有权力自用此称号，叫作 Melek-i-Rum Kaisar，即“罗马的副王、凯撒”。“罗马王”（King of Rūm）是苏利曼的称号，他驻守小亚的伊科尼乌姆（Iconium）。同时，他还

① 参见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 1 辑，第 60 页。

② 参见徐家玲：《拜占庭还是塞尔柱人国家》，《古代文明》2009 年第 4 期。

③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1,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5, p. 56.

④ 参见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 1 辑，第 61 页。

⑤ 参见杨宪益：《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见《译余偶拾》，北京：三联书店，1983 年，第 212—213 页。

指出,鞍马刀剑真珠都是叙利亚的特产,大马士革的马鞍、刀剑尤其著名。^①

不过 25 年之后,夏德发表《拂菻之谜》时,其观点已有所改变。由于他坚持中国文献中的“拂菻”是以叙利亚为中心的罗马帝国东部边地的见解,所以他认为《宋史》“拂菻”是“伪拂菻”(Pseudo Fu-lin)。他认为,从地理位置上,《宋史》“拂菻”就是位于小亚的塞尔柱人国家,这一点他原来的观点没有改变。但他修正了“灭力伊灵改撒”的考证。他认为,这个名字的最后两个字“改撒”代表希腊语的 *Kαῖσαρ* (*Kaisar*),“灵”则代表 *Rūm*,“灵改撒”对应于 *Rūm Kaisar*,相当于“罗马皇帝”。他当初之所以反对将“灭力伊灵改撒”考证为 Michael VII Parapinaces,而以塞尔柱的苏利曼相比对,是因为此人已在 1078 年逊位,当年没有意识到 1081 年“拂菻”使节到达中国时,有一个人在小亚自称“凯撒”、随后被授以“凯撒”称号,此人就是 Nicephorus Melissenus。他赞同沙畹的见解,将“灭力伊灵改撒”考订为 Nicephorus Melissenus。他认为,虽然“凯撒”之称是在 1081 年 4 月初正式授予 Melissenus,但当时的政治形势表明,他在 1078 年实际上已经自称凯撒,并且很有可能以“凯撒”的名义铸造钱币。如果入华使节在 1080 年中从小亚动身,那么当时在这个国家存在着两位统治者:一位是 Melissenus,一位是在伊科尼乌姆的苏丹苏利曼。将这所有因素加以考虑,则不宜假定苏利曼本人就是中国史籍上的“改撒”。此时小亚的“改撒”即是 Melissenus。夏德从这一点出发,认为“灵改撒”即 *Rūm kaisar*,这个称号之前的名字“灭力伊”就是 Melissenus。他认为《宋史》的“灭力伊”比 Melissenus 的唯一困难在最后一个“伊”字。他的解释是,在宋代的印刷文字中,出现偏旁上的错误是常见现象,如“狮”印为“师”,“碇”印为“靛”,“诞”印为“延”,

可以推定,“伊”可能原作“苐”,而“苐”可能是“笋”之误用,“笋”的古读音为“从尹切音笋”,即读 *sin* 音。如此,这位凯撒的名字则可复原为 *Mié-li-sun*,广东音读若 *Mit-lik-sun*,其中 *t, k* 脱落后读若 *Milissun*,这也许就是希腊语 *Μελισσηνός* 经中介的突厥译人的翻译后的对应词。夏德还指出,现在所能见到的 Melissenus 的钱币制式是正面有圣母像,举手做祈祷状,头部有光环,以惯有的略写文字注明“圣母”,背面有五行铭文作: *Νικηφορω δεσποτη τω Μελισσηνω* (其意为:“Nicephorus Melissenus 君主所造”),这可能就是《宋史·拂菻传》所谓“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的真实含义,因为弥勒佛久为中国人所熟悉,所以才将钱币上的图像说成是弥勒佛。^②

白鸟库吉于 1904 年发表其研究成果时,赞同夏德从前的观点,认为“灭力伊灵”为 *Melek-i-Rum* 对音,他与夏德的不同点在于:第一,夏德认为《宋史》“拂菻”为叙利亚,白鸟坚信其为小亚罗姆苏丹国,“灭力伊灵改撒”即苏利曼;第二,欧洲各汉学家(包括夏德)考订“改撒”为 *Caesar*,白鸟认为苏利曼虽有 *Melek-i-Rum* 称号,但是否被成为 *Caesar* 并不能确知。他根据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苏利曼曾称 *Ghazi*,“改撒”或即此称号的译音。*Ghazi* 在阿拉伯语中亦称 *Ghaz*,其义为“信仰的防卫者、信仰的勇士、勇敢的战士、胜利”。故“灭力伊灵改撒”应为 *Melek-i-Rum Ghazi* 的译音。^③

以上诸家观点中,以夏德最初的观点为最妥当有力。从很早的时候,波斯人和亚洲其他民族就以 *Rum* 称呼罗马帝国,后来又以此名称呼包括小亚、亚美尼亚、叙利亚等领土的拜占庭帝国,所以 *Rum* 和 *Caesar i Rum* 经常出现在波斯文献中。阿拉伯伊斯兰势力兴起以后,阿拉伯作家继续用同样的名字称呼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欧洲的领土。11 世纪末塞尔柱突厥夺取小亚,建立了突厥

① 参见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Leipzig & Munich, Shanghai-Hongkong, 1885, pp. 299-300。

② 参见 F. Hirth, *The Mystery of Fu-lin*,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30 (1909-1910), pp. 25-29。夏德看到的版本作“面凿弥勒佛,皆为王名”,他断定“皆”应为“背”。此见解为其他版本证明不误。可见西方汉学家立说,颇善用“大胆假设”之研究方法。我国史学研究传统强调“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信条,“小心求证”有余,“大胆假设”不足,致使错过许多立论机会。

③ 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 1 辑,第 61-62 页。

政权,但亚洲民族仍以 Rum 之名呼之,同时也用此名称呼拜占庭帝国。13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取代塞尔柱突厥在小亚的势力后,这个名字又转移到奥斯曼帝国在亚洲和欧洲的领土上。所以在穆斯林作家的作品中,1402 年被帖木儿俘虏的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Bayazed)被称为 Kaiser-i-Rum。^①对于刚刚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小亚领土的塞尔柱苏丹而言,“灭力伊灵”(Melek-i-Rum Kaiser)所表明的是,他既想保留以往的称号 Melek(Malik),又想体现他作为新征服领土主人的身份。Melek-i-Rum 这个混合性名称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含义,而 Kaiser 这个称号的使用无非是借罗马帝国的传统称号,表明其对新征服土地的合法性。“灭力伊灵改撒”这个称号,就是塞尔柱苏丹灭力沙将 Kaiser 称号移植到 Melek-i-Rum 后面的结果。于是,就形成了 Melek-i-Rum Kaiser(“罗马的马立克、凯撒”)这样的复合头衔。

与“灭力伊灵改撒”的考订相联系的,是“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一句的考订。夏德将此断为“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与“判来”,将前部比对为“the governor Nestorius Simeon”或“the governors Nestorius and Simeon”,即“聂斯托里乌斯·西孟长官”或“聂斯托里乌斯与西孟两长官”,而将“判来”理解为“结伴而来”,因“判”与“伴”为同音。《宋史》卷四九〇记阿拉伯使团成员有:使、副使、判官,可证“判官”即“伴官”。夏德认为,拂菻就是叙利亚,唐代拂菻遣华使节乃景教大主教所派,所以凯撒的使节大可不必将他们视为罗马皇帝的代表,可以对以前的遣华使节只字不提。^②如果说夏德此考订之前论尚属一家之言,则“判”、“伴”之论纯属穿凿附会,不足为凭。

白鸟库吉认为,“你厮都令厮孟判”所带物品如鞍、马、刀、剑、真珠均属于世俗用品,当为世俗官员,“你厮都”或为官名,“令”与“灭力伊灵”之“灵”同为“Rum”之译音,而“厮孟”或为 Osman 或 Soliman 之译音,而“判”则或为 Beg、Bey 或 Pa-

sha 之译音。^③白鸟的比对玄猜过分,支离破碎,令人难以置信。

杨宪益认为,当时欧洲贵族的尊称为 Maistre,此极可能为“你厮都令”的本字。此名最后二字“孟判”令人又想起当时最著名的一门望族,即 De Montfort。著名的十字军英雄 Simon de Montfort 的曾祖亦名 Simon,可能即为“厮孟”的原字。Simon de Montfort 一世的时代正与拜占廷遣使中国的时代相合,极可能为当时来中国的大使。因此,你厮都令厮孟判即为 Maistre Simon de Montfort 的译音。^④此说论证虽巧,但格于历史证据,尤其是格于拂菻与拜占庭帝国比对的困难,只能聊备一说,不可轻易接受,视为断论。

关于“拂菻”遣使中国的动机,亨利·裕尔倾向于将“拂菻”比对为拜占庭,但他对拜占庭遣使的动机表示“不敢斗胆猜测”;^⑤夏德倾向于认为这次遣使是拜占庭的僭主与塞尔柱苏丹所派,但同样不敢对遣使动机做出推测。^⑥杨宪益将“拂菻”比对为拜占庭帝国,认为遣使乃由于塞尔柱突厥势力的崛起和逼近。塞尔柱突厥人夺取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统治,建立罗姆苏丹国,东起幼发拉底河,西抵君士坦丁堡,北临黑海,南达叙利亚,且征服耶路撒冷,攻势咄咄逼人,拜占庭曾向西方欧洲国家求援。拜占庭的这三次遣使,显然也是为求援之目的。可能当时使节曾请中国出兵夺回小亚细亚,所以才将此州的财富详告中国朝廷。^⑦

杨氏此论存在的问题,一是将此时的“拂菻”比对为拜占庭帝国,未为不易之论;二是此时的宋王朝不可比于鼎盛时期的大唐帝国之幅员辽阔,并不像唐朝经营西域时声势浩大,影响远被。北宋王朝所处的形势是,其北阻于辽,其西阻于西夏,势力仅淹及中原,不可能成为拜占庭帝国联合的对象,拜占庭帝国既然想联合宋朝,想必了解此中真相,岂可寄希望于遥远无望之水而解眉下灼灼之渴。“联合中国说”未中鹄的。

以理度之,此时塞尔柱突厥已经置阿拉伯哈里

①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II,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Ltd, 1910, pp. 306-307.

②⑥ F. Hirth, *The Mystery of Fu-lin*, ibid, pp. 29-30.

③ 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见《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1辑,第62页。

④⑦ 杨宪益:《宋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见《译余偶拾》,第213—214页。

⑤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 56.

发于控制之下,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之主宰,且又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小亚拜占庭帝国重要领土,其势如日中天,俨然为新兴世界之强权与霸主,此时遣使他邦,宣示国威,扬名他域,直意中之事。且塞尔柱突厥本兴起于中亚,虽辗转西迁,但对东方帝国中国仍保持其记忆。故可推断,详告中国宋朝廷塞尔柱突厥统治者之风俗面目,新征服领地物产之丰饶,炫耀其战果之辉煌,成果之丰富,乃是遣使的目的。^①正如后来奥斯曼土耳其于嘉靖年间(1522—1566)遣使明朝中国,其理相同。^②

三

“拂菻”名义下的最后一次遣使是在元末明初。《明史·拂菻传》提到“元末,其(拂菻)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赍诏书还谕其王……已而复命使臣普刺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贡。后不复至。”

洪武四年(1371),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强大压力之下,国土日蹙,国势危机,已呈苟延残喘之态。《明史》明言“捏古伦入市中国”,说明此人乃贾人,而非正式使节。以此贾人付托外交使命,正如隋代炀帝重臣裴矩经营西域而以西域贾人充任使节行事,其无果而终,可以想见。^③不过,明代使节普刺出使,似完成了使命。

张星烺认为“捏古伦一去不返,究竟已达欧洲否,莫得知也。其后使臣普刺等复奉命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普刺等似已达其国,故以后乃遣使入贡也。惜其无详细纪行书以留后世也。由普刺之名观之,其非汉人可断然也。普刺岂亦捏古伦之同国人欤?捏古伦吾人既承认为 Nicholas 之译音,普刺岂 Paul(今译作保罗)之译音欤?”^④杨

宪益认为,捏古伦原文当是 Nicholas,既为东罗马商人,此名又极普通,难以考证。但明使臣普刺其人其事应加注意。普刺似为波斯文 Pulad 的译音,如此则为波斯人。此名在蒙古文中又作孛罗(Bolod),如《拂菻忠献王神道碑》所言 1285 年出使波斯不回的孛罗丞相,及 1314 年奉使波斯的另一孛罗丞相,当皆为波斯人,元史宰相表又记有 1330—1340 年的另一孛罗丞相,很可能此数人原是同宗,为明太祖出使的普刺也许就是《元史》中孛罗丞相的后裔,因其家熟悉西域地理而被遣。杨宪益进一步提出东罗马最后一次遣使来中国大约在洪武四年以后若干年,其时东罗马皇帝约翰(Paleologus)或麻努弗(Manuel)在位,突厥素丹巴耶塞特(Bayazet)已占东罗马领土大部,中亚帖木儿帝国的扩张延缓了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东罗马与中国通使当经帖木儿地。《明史》“哈烈”条言:“元驸马帖木儿既居撒马尔罕,又遣其子沙哈鲁据哈烈,洪武时撒马尔罕及别失八里咸朝贡,哈烈道远不至,二十五年遣官诏谕其王,赐文绮彩币。”这似乎就是普刺使拂菻事,如此则普刺出使当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亦即东罗马皇帝麻努弗即位次年。东罗马遣使入贡当在此后数年内,其时帖木儿方与巴耶塞特对战,据克拉维约(Clavijo)记载,当时东罗马曾遣使至帖木儿帝国,遣使来中国可能即在同时。^⑤这种观点值得重视,但限于资料的缺乏,很难得到确证而落实。1453 年,元气丧尽的拜占庭帝国终于亡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此后中国文献中的“拂菻”名下的纪事已是历史往事。

(责任编辑:匡云)

①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p. 133. 姜伯勤认为,宋代文献中的拂菻遣使乃拜占庭帝国所为,拜占庭人乃是沿着从于阗通往吐鲁番和敦煌的道路前往中国。见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24—25 页。此说非是。

② 参见《明史》卷三三二;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1 册,第 468—469 页。

③ 《隋书》卷六七“隋炀帝时,遣裴矩通西域各国,独天竺、拂菻不至,为恨。”以中国史籍记载看,隋炀帝显然没有派出使节前往拜占庭帝国报聘。《隋书·裴矩传》记载“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裴矩经营西域时可能是从拜占庭商人那里得到拂菻消息,同样也可能是通过商人们传递隋炀帝之意愿。

④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1 册,第 422 页。

⑤ 杨宪益:《明代拂菻通使考》,见《译余偶拾》,第 219—220 页。

inherently decided the research trend of tributary system. However, th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bout these three issues were in confusion. Based on the actual composition, oper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rules of tributary system, we should re-emphasize the tributary conception, confirm the basic position of Hua-Yi concep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tributary system theory, and stand out the basic policy of dynasty's realistic interests centered on maintenance of land-based country safety behind the complex changes of dominate dynasty's tributary policy. This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corr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udy of tributary system theory.

Baoshi Ying and His Efforts to Make the 1871 Sino – Japan Agreement in Tianjin

Kewei Chen

Qing government considered deliberately to make the 1871 Sino-Japan Agreement in Tianjin under the request of Japanese Meiji government. Ying Baoshi had ten-year experience of dealing with foreign affairs in Shanghai and also directly contacted with Japanese merchants several times. So he was appointed as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 to make this Agreement.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Agreement, first of all, Ying Baoshi combined with his former case and recent business with Japan, distinguished cautiously item by item to the Eighteen Items drawn up by deputy Tianjin custom officer Qin Chen and replied. Then he added Twelve Items to make up for some in the Eighteen Items which were missing and inappropriate. Later,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Reply and Twelve Items were adopted in the final Friendship Agreement and Business Agreement signed by China and Japan. Thus he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Agreement.

Commentaries on the Research of Category in Classic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Yonghao Wang

The research in category is a hallmark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was taken seriously by scholars at the very beginning, and brought about the first publications. However, it was not fully launched off until 1978, and it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research in Chinese history. The literary academia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issues of veridicality of category, the system, and the transference. However, some problems arise from the boom of papers, monographs, series, and dictionaries, such as more main categories with few subcategories, more examples and few generalizations, more limited explanations and few systematic explanations. Hence, the forthcoming ecologically sound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in multiple dimensions. To render the whole research deeper and more mature we must define category, understand its distribution and organization, discern its referents and levels, and highlight its system.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in *the C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iguo Zhu

In a long term *the C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A large number of retained information on those *Ci* were not concerned, and becam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data. This state of affairs didn't begin to change until the nine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about *the C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several issues should have to make a further breakthrough: in term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ollected and collated; specialized system of basic research; improvement of research idea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Singing Poetries of Fu Tu

Xuexiao Sun

In the history of music literature the tradition of singing is time-honored. When the ancients use the word of *song* to named their poetries or the behaviour of singing poetries, what they were actually defining is not the rhyme but the musical expression of the poetries. Until the Tang Dynasty, *song* is also one of the favourite medium of poets to spread their poetries. That is why there is so many Singable Poetries be created during this period.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chooses Tu Fu who occupied an important berth in the poetry circle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represented the fully developed of the artistic feature of poem writ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n So-called *Fu-lin* Embassies to China in the Post-Tang Period in Chinese Sources

Xushan Zhang

In the post-Tang period, several embassies to China were recorded in Chinese sources under the name of *Fu-lin*, which is design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for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name *Fu-lin* did not refer to the Byzantine Empire, but the Rūm Sultānate of the Seljuks who had occupied the Asia Minor, and the embassies were dispatched by the Seljuks.